

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鹭：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王伟 倪超

摘要：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崔融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鹭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关键词：杜审言；文章四友；张说；杜甫；宋之问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4)06-0147-10

初盛唐之际，诗人群体交往频繁，诗名并列传为佳话。其中，杜审言和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此称号最早见于《新唐书·杜审言传》：“（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1]5736}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也载有此说。所以，游国恩、台静农、钱基博、袁行霈主编的文学史不约而同地将“文章四友”作为记载杜审言的既定事实来引用^①，陈尚君、陈冠明等学者也将名列“文章四友”视为杜审言文学地位的锚定之笔^②。

然而，相较于同时期的“初唐四杰”“苏李”“沈宋”“珠英学士”等，“文章四友”的这一称谓和人物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和文学互证，因此有学者对“文章四友”提出过异议^③。本文在分析“文章四友”创作情况的基础上，与张说对当时文士的文学评价进行对比研究，探讨“文章四友”被塑造的痕迹和原因，以及其中所体现出的人物排序、文学接受、评价标准等问题，以期反映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

味道、薛稷、宋之问诗坛交谊的相互性与诗名评鹭的差异性。

一、《新唐书》对“文章四友”的塑造

宋之问的《祭杜学士审言文》中有对“初唐四杰”的品评，却没有论及“文章四友”。宋之问是杜审言的挚友，如果“文章四友”称号盛行于世，宋之问在祭文中不会只字未提。实际上，“文章四友”的提法只在《新唐书》及之后的文献中出现，包括《旧唐书》在内的之前文献中却从未有过。而且，“文章四友”的称号在《新唐书》中只单独出现过一次，包括崔融、李峤、苏味道在内没有其他传记的互见佐证，而如“苏李”“四杰”等世称皆能在不同的传记中找到旁证。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载“文章四友”的行文皆沿袭《新唐书》的说法，卒无新料。

《新唐书》载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交往

收稿日期：2023-08-10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

作者简介：王伟，男，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陕西西安 710061）。倪超，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陕西西安 710061），江苏警官学院讲师（江苏南京 210031）。

的时间在其年少时期,这一记载有误。《唐会要》载:“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阁朝有诗送之。名曰《存抚集》,十卷,行于世。杜审言、崔融、苏味道等诗尤著焉。”^[2]¹⁴¹⁴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共四十韵八十句,确实在粘式律方面相当出众。此时李峤为“给事中”^[1]⁴³⁶⁷,也属阁朝之臣,从长寿元年(692年)李峤为李嗣真等人辩冤之事可知二人交情匪浅,因此李峤或许也有诗送李嗣真。换句话说,行于世的《存抚集》应该是杜审言与崔融、苏味道、李峤诗名并存的起点,而天授二年(691年)杜审言已四十多岁,不再年少。

就杜审言和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和文坛影响来看,杜审言和他们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李峤、苏味道被狄仁杰推荐“亦足为文吏”^[3]²⁸⁹⁴，“苏李”组合通行后世：“上谓颉曰：‘前朝有李峤、苏味道，谓之苏、李’。”^[3]²⁸⁸⁰李峤、苏味道都担任过宰相，皆任内廷要职、御前显官；而杜审言仕途蹇舛，只是当时众多普通文人之一，大半生蹉跎于基层文官。朝堂地位的圈层决定着文学交往的范围，杜审言和李峤、苏味道虽有交往，但酬唱之作稀少，甚至有来诗无去诗，他们以“友”之名声张于外，不大可信。因此，初唐文坛未有“文章四友”的称号。

那么，《新唐书·杜审言传》中为何将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列，塑造“文章四友”为“世号”呢？笔者认为主要和杜甫有关。一方面，杜甫在自己诗文中给世人留下了“吾祖诗冠古”^[4]⁷⁶⁷的深刻印象，为宋人关注其祖父杜审言埋下了伏笔。杜甫在诗中曾言“诗是吾家事”^[4]¹⁴⁷⁸、“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4]¹⁴⁰⁰，在赋文中言“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于今而师之”^[4]²¹⁷²。在注重门第的唐代社会，杜甫在《宗武生日》《赠蜀僧间丘师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进雕赋表》等诗文中言及杜审言的真实意图，是欲借杜审言的官场、文坛声誉来抬高自己，其中有夸大成分，并非杜审言在当时真有“诗冠古”的文学水平。另一方面，《新唐书》两位主要撰者宋祁、欧阳修都对杜甫赞誉有加。欧阳修诗云“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5]，可以说“宋代尊杜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6]²⁹⁰。宋祁有《拟杜子美峡中意》《拟杜工部九成宫》《和贾柏公览杜工部北征篇》等拟杜诗，他还创作了《题蜀州修觉寺》《春日出粽花溪》等缅怀杜甫的诗歌，“从宋祁个人的诗文，也可以见出其对杜甫的赞赏”^[7]。

《新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从宋初欧阳修等人对杜甫的推崇，到宋中叶杜甫被整个诗坛奉为典范，史书的撰写也必然受到尊杜时风的影响。杜甫诗学之宗的建立需要一个更为人所信服的家族背景，杜审言作为杜甫祖父必然也被重新认识并受到重视。基于这样的文化需求，《新唐书》中对杜审言的文学交往进行了一番考量，在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的交往基础上塑造了“文章四友”。

对比新旧唐书便可看出《新唐书》在加强杜甫与杜审言关系上所下的功夫。《二十四史考异》云：“旧以杜审言附易简，今以易简附审言。杜甫旧在别卷，今移附审言之下。”^[8]在体例上，《旧唐书》中，杜审言列在“文苑上”，杜甫列在“文苑下”，各自单独成传，距离较远；《新唐书》中，杜审言和杜甫同被列在“文苑上”，两者紧密衔接。在内容上，《新唐书》在篇头显著位置增加了杜甫对祖辈的陈述，彰显杜甫家族的显赫历史和文学渊源：“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1]⁵⁷³⁷。《新唐书》在体例安排上将杜审言和杜甫捆绑，在撰写增补上有意凸显杜审言，为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加码，有意提高杜审言的文学地位，以此表明其孙杜甫有显赫背景和诗文传承，肯定杜甫的诗学渊源，从而奠定杜甫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典范地位。

总而言之，鉴于杜甫的诗歌成就，《新唐书》将其祖父杜审言与中宗时文坛地位较高的李峤、崔融、苏味道相提并论，又因四人有交集，遂冠以“文章四友”，加“世号”而成名。可以说，由于宋人对杜甫的尊崇，杜审言在《新唐书》的史笔中被拔高了，“文章四友”的称号因此而生。

二、“李、崔、薛、宋”与“崔、李、苏、杜”排序之比较分析

杜审言活跃于武后和中宗时期，当时文坛上的“珠英学士”和“修文馆学士”最为显赫。“张说是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亦是初唐文艺风潮的转换人物。”^[9]²《集贤注记》中载有张说与徐坚当时学士文词高低的讨论：

十六年，张燕公拜右丞相，依旧学士、知院事。燕公与徐常侍圣历年同为珠英学士，每相推重。至是，旧学士死亡并尽，唯二人在。燕公尝手写同时诸人名，与观之，悲叹良久。徐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文词之美，敢问孰为先

后?”燕公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徐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若数子者,各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可继于前贤尔。^{[10]247}

《大唐新语》《旧唐书》《新唐书》《太平广记》《职官分纪》等史书中都有张说文学评论的记载,行文虽有变化,但“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的记述保持一致,这说明张说的论评确有发生,观点也被后世所认可。张说与当时文士交游甚广,“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11]2981},所以张说对杜审言所在时期的文坛是非常熟悉的,有关“李、崔、薛、宋”的文学评价最接近当时文人的实际情况,对考察杜审言的真实文学影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说的文学评论,先言张说、徐坚“圣历年同为珠英学士”,后言“旧学士死亡并尽”,从时间的跨度和成员的消逝可知“旧学士”的范围,应起于圣历元年的“珠英学士”,终于景龙二年的“修文馆”学士。这期间包括两个文人集团,一个是“珠英学士”,另外一个在此时段弘文馆(包含崇文馆、昭文馆、修文馆)的学士,两个集团的文人互有交叉。具体而言,“珠英学士”包括“张昌宗、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愬、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12],“修文馆”学士包括“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李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义、岑羲、刘子元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又引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备员”^{[1]574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崔融“初,应八科举擢第,累补宫门丞,兼直崇文馆学士”^{[3]2996},说明崔融曾是崇文馆学士,“时张易之兄弟颇招集文学之士,融与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麟台少监王绍宗等俱以文才降节事之”^{[3]3000},说明崔融参与了《三教英珠》的预修;张说于景龙三年(709年)“服终,复为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3]3051},说明张说加入了弘文馆学士。

徐坚先问的“诸公”是指“旧学士”,张说所答首先是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且只有这四人堪称“前贤”,其余皆有“所阙”。然而,在当时文坛中,还

有时号“苏李”的苏味道、世号“文章四友”的杜审言和“沈宋比肩”的沈佺期,为何苏味道、杜审言、沈佺期三人未在评论之列?

苏味道“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3]2991}。不过可惜的是,苏味道并不是“珠英学士”,一生也没有“学士”之职。《旧唐书》载:“吏部侍郎裴行俭先知其贵,甚加礼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为管记。……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长安中,……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神龙初……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赠冀州刺史。”^{[3]2991-2992}由此可见三点:一是苏味道虽文笔不错,但仕途却因裴行俭举荐而进,并非词采;二是“圣历初”至“长安中”,正是张昌宗召集学士修撰《三教珠英》的时间段,而苏味道任“凤阁侍郎”却未见其入列,说明他虽年少知名但文章于当时已居人后;三是苏味道卒于“神龙初”,因此不可能成为景龙二年(708年)的修文馆学士。所以,张说的论评中未有苏味道。

沈佺期、宋之问和张说既是“珠英学士”又是“弘文馆学士”,且沈、宋齐名,唐元稹言:“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3]5056}相对而言,张说与沈佺期的关系比宋之问更为密切,“沈佺期、张说还曾同时知贡举”^{[9]55},而睿宗之后张说与宋之问再无交集,却与沈佺期应制的次数和共处的时间很多。可是,张说列宋之问而舍沈佺期,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一是宋之问在三人初聚的“珠英学士”中表现较为突出,“易之、昌宗皆粗能属文,如应诏和诗,则宋之问、阎朝隐为之代作”^{[3]2707},这给张说留下了宋优于沈的先入为主印象。心理学中有“首因效应”一说,“首因效应”是指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对以后评价的影响,张说有可能受到“首因效应”的影响而取宋。二是沈佺期的词采确实不及宋之问。《唐诗纪事》云:“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13]64}明代胡应麟认为:“沈、宋本自并驱,然沈视宋稍偏枯,宋视沈较缜密。沈制作亦不如宋之繁富。沈排律工者不过三数篇,宋则遍集中无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赡丽精严。”^{[14]362-363}虽然刘餗的《隋唐嘉话》载张说评沈佺期“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15],但“这段材料疑窦丛生”^{[9]55},不足为证。也许张说认为,沈、宋二人文章相近,取其优者即可。

三是张说可能因与姚崇有嫌而对沈佺期不满。姚崇于“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寻迁中书令”^{[3]3023},此时“沈佺期为起居郎,充修文馆学士,在长安,陪游宴唱和。迁中书舍人”^{[16]805},中书令与中书舍人是直接接触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姚崇与沈佺期关系应当不错。玄宗时张说与姚崇相忌,可能在评论当时文士时有意忽略沈佺期。

杜审言与薛稷、宋之问同为修文馆直学士,都在张说的评论范围之内,如果“文章四友”的“世号”在当时文坛已然成形,张说在评论李峤、崔融时,不应该将与之齐名的杜审言排除在评论之外。就连在修文馆直学士中排名在杜审言之后的阎朝隐,也被张说评论为“如丽服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9]247},而他却对杜审言没有只言片语,这说明“文章四友”之名不符合杜审言的真实情况。

将“文章四友”中“崔、李、苏、杜”的排序与张说“李、崔、薛、宋”的排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文章四友”的组合有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文章四友”既以“友”称名,却不包含与杜审言交好且与李峤、崔融齐名的薛稷、宋之问。《旧唐书·宋之问传》载:“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3]5025}其时任修文馆学士的人不少,如“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为直学士”^{[1]5748},多为至交好友,《宋之问传》中特意将薛稷、杜审言二人列出,说明三人在当时是一个过从甚密的固定团体。

薛稷家族背景深厚,官至太子少保,经常参与宫廷活动并应制作诗。其诗《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被杜甫评价为“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13]326},说明薛稷的文词水平在当时属于佼佼者。就文学水平看,依张说之评,排在崔融、李峤之后的应是薛稷,而非苏味道。就文学交往看,苏味道不在“珠英学士”之列^④,与这些文士交流的机会有限,他卒于“神龙初”^{[3]2992},也不可能成为修文馆学士,而薛稷与杜审言同为直学士,其交往程度必然优于苏味道。此外,“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隶书”^[17]。《蔡宽夫诗话》载:“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18]杜闲为杜审言之子,其书法既“出于薛稷”又“自其家法”,说明杜审言和薛稷在书法上亦有交流。

“文章四友”中没有宋之问极不合理,因为与苏味道相比,宋之问与杜审言的关系更为密切。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中言:“自予与君,弱岁游执,

文翰共许,风露相浥。”^{[11]2442}这说明两人交往甚早,“弱年”要比苏味道的“少与”早很多。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被贬,宋之问病中赠诗《送杜审言》,“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16]398}之句情真意切。神龙之后,杜审言和宋之问同时被贬,宋之问有诗《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诗题中三人的排序与上文景龙二年任直学士时的排序是一致的。这说明早在神龙初,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的排序已经约定俗成,在四人的相互唱和中是被认可的。世人皆知“沈宋比肩”^{[11]1020},却忽略了中间的杜审言,其实“宋杜”的关系更为密切。杜审言与宋之问于景龙二年同为修文馆直学士,而后“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1]5736}。宋之问看望病重的杜审言,可见二人交情已达临终托付之深,也可见杜审言“傲世见疾”^{[1]5735}的性格,明明“杜审言华藻整栗小让沈、宋”^{[14]354},杜审言非要自称“久压公等”,实属大言。此外,宋之问是唯一为杜审言写祭文的人,二人情谊交深可见一斑。

与薛稷、宋之问相比,苏味道与杜审言的关系相当一般,《新唐书》所载“文章四友”舍薛、宋而取苏,显然没有从杜审言文学交往的实际出发。究其原因,是由于薛稷和宋之问的历史评价存在瑕疵,无法达到抬高杜审言的史笔目的。薛稷因依附太平公主谋逆而被赐死,宋人推崇杜甫,自然不会将谋逆之人与杜审言产生紧密关系。宋之问虽属于后起之秀,但在出身、官阶、声望等方面都相对较低,人生结局也是“赐死于徙所”^{[3]5025},再加之因诗杀亲、卖友求荣、逢迎谄媚等劣迹,宋人也不愿意让宋之问与杜审言互称为“友”。

由此可推,“文章四友”在初唐时并未成形,杜审言与李峤、崔融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其文学影响力远远不如二人。张说所论更符合初唐文坛的真实面貌,而“文章四友”之名更像是后人为塑造杜甫的经典形象而有意为之。

三、杜审言“因其后显”的文学接受历程

与张说文学评论的“李、崔、薛、宋”相比,“文章四友”的世号与后世推崇杜审言之孙杜甫有很大关系。游国恩先生认为:“‘四友’之中,杜审言的成就

较高。”^[19]袁行霈先生也认为,“文章四友”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20]。实际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与杜审言是杜甫祖父的文学接受历程,以及胡应麟特别推崇杜甫有非常大的关系。学界在杜审言与杜甫的研究中,多言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如潘玥先生的《小议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胡永杰先生的《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等。其实,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杜甫成业后杜审言才被文坛所重视和挖掘,杜审言在后世文学评价中的提高反而是受益于杜甫。杜审言的文学接受过程可梳理如下。

唐初,杜审言的自我评价和旁人的诗文评价有谀谄高估之嫌。杜审言自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1]5735}初唐文人高傲自大的言行是普遍存在的,杜审言也不例外,宋代陈振孙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甫之家传有自来矣。然遂欲衙官屈、宋,则不可也。”^[21]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剿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11]2164}此序作于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陈子昂亦弃官归去,两人惺惺相惜,吹捧之意显而易见。杜审言卒后,宋之问在祭文中言其“名声高而命薄”^{[11]2442},没有对杜审言的文词作太多评述,只以屈原、杨雄、“王杨卢骆”等相衬,明显有夸大成分。不可否认,杜审言在律诗的创作上有一定的成就,但若以陈子昂、宋之问之言看待杜审言,显然不切实际。

宋代开启了杜审言围绕杜甫的文学接受,在诸多文献中,凡提杜审言处必提杜甫以彰其显,如:

必简之师,其竟已甚,又有少陵以为之孙,遂建大将鼓旗以出,独主百世诗人之夏盟。^[22]

古之诗人以诗闻世多矣,而鲜世其家。杜审言有孙甫。^{[23]105}

唐杜审言生闲,闲生甫,然后诗名显。^{[23]304}

余观工于诗者代不乏人,而能世其家者几希。惟杜审言之孙甫最为烜赫。^{[23]139}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尝观其祖审言《除夜》云:“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则教忠之家风旧矣。^{[14]354}

杜审言、黄亚夫之诗,皆因其后显,文章有源委哉!^{[23]248}

杜审言字必简,子美大父也。^[24]

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

宋之问相唱和。^[25]

其中“因其后显”点明了杜审言成名的关键因素,杜审言是因为其后人杜甫才诗文显贵,杜甫是杜审言的身份标签,如果没有杜甫在宋代文坛的诗宗地位,杜审言就不会“诗名显”,甚至可能不会被关注。“北宋中叶开始的尊杜倾向并不是少数诗坛巨子的个人选择,而是整个诗坛的共识。”^{[6]292}宋代评论杜审言的文人群体,包括杨万里、何梦桂、周必大、袁燮、黄彻、陈振孙、郑清之、邵博、魏庆之等,都生活在《新唐书》成书之后,这与尊杜的文学接受进程是一致的。宋人对杜审言的认识多与杜甫有关,杜甫的影响力直接赋予杜审言更高层次的文学评价,所以说杜审言是“因其后显”。

至元代,杜审言和杜甫祖孙二人同为诗坛巨匠已被传为佳话。《唐才子传》载:“成业者获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间尤难……公孙如杜审言、杜甫。”^{[26]227-228}杜甫以诗歌纪史,格律工整,忠君体国,是谓“成业者”;而杜审言在初唐众多宫廷诗人中并不显眼,单明文记载的同时期的“珠英学士”有26人,“修文馆学士”19人^⑤,还有很多未载明的。杜审言的诗歌与其他时人诗歌并无二致,内容也以应制为多,视其为“成业者”显然有所拔高。

明代是杜审言被推向律诗之宗的重要时期,明初文人对初唐诗坛的认识中,杜审言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与“王杨卢骆”“沈宋”等相提并论。这在诗歌选集的对象选择上可见一斑:

天一阁书目四之三:十二家唐诗刊本,明嘉靖壬子,永嘉张逊业序首。江都黄埭梓行。题其后曰:“王、杨、卢、骆,沿六朝之习,为天赋之才,宝一代声律之发硎,自是文运益昌,乃有陈、杜、沈、宋倡于前,王、孟、高、岑继于后。”^[27]

诗纪,一百五十六卷。明冯惟讷辑,存初唐诗纪卷十六至三十,凡十五卷。清何焯朱笔点勘。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陈子昂诗,跋云“康熙乙未八月借安溪先生架上宋本校过”。其余杜审言、刘希夷、李峤、沈佺期皆校勘至精,第不知所据何本。^[28]

明代诗歌选集的刊印校勘集中反映了文人诗学的品评思想,《十二家唐诗刊本》将杜审言列于“沈宋”之前,《诗纪》对杜审言“校勘至精”,都说明在明代文人眼中,杜审言的文学成就已与陈子昂、李峤、沈佺期、宋之问、刘希夷等诸多名家处于同一水平。

在提高杜审言文学地位的过程中,胡应麟起了关键作用。《诗薮》直接将杜审言立为律诗开山之

人：“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14]355}“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14]355}这样的文学定位与胡应麟尊杜“三难说”中的“首创难工”一说有直接关系。胡应麟评杜甫云：“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道源，为百世师。”^{[4]11}对比他对杜审言的评价，不难发现，他是将杜甫的“首创难工”向前推移到了其祖父杜审言身上，认为杜审言是七言律、五言律的开创精工者。在胡应麟的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的文学评论已经将杜审言视作诗家的一派宗师和近体诗的开端之人。钟惺《唐诗归》云：“必简数诗，开诗家齐整平密一派门户，在初唐实亦创作。”^{[14]355}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14]355}然而，明代文人对杜审言文学地位的推高并不符合客观情况。唐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载：“唐兴，学官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11]6649}“依艺生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11]6650}元稹作为中唐之人，对初唐文坛的发展情况更加了解，文中对“沈宋”的律诗贡献肯定有加，而对杜审言只有“善诗”的评价，并未提及其文学贡献。《新唐书·文艺上》在综论唐代文学发展盛况时也未提及杜审言，列举知名宫廷诗人时仅言：“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1]5726}可见，杜审言的诗歌虽格律严谨，是格律创作的践行者，但以文学影响和诗歌开创而论，较之沈佺期、宋之问，他还稍逊一筹。若论律诗的定型，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才是开端。胡应麟论杜审言对律诗有“首倡”之功，王夫之论杜审言是近体诗的“始叶”之人，都视杜审言的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名家，这显然言过其实，这种过高的赞誉很大程度上是杜甫律诗成就所造成的影响。

至清代，对杜审言的文学接受仍在继续。罗惇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校证》中有一首诗专门咏杜审言：

醉来瞋视骇登床，不意孙狂祖更狂。
身与李崔矜唱和，目无屈宋好低昂。
浪夸羞死模棱老，祇惜求官城媚娘。
未得替人君莫恨，浣花诗笔跨全唐。^[29]

此诗基本涵盖了杜审言一生中的典型事迹，首联即写杜甫与严武互争之事，颌联写杜审言与李峤、崔融的唱和及其“衙官屈、宋”的自大，颈联写杜审言“羞死”苏味道之事及被起用后“蹈舞谢”武后之举，尾联写杜审言临终与宋之问的遗言。从这首诗

可以看出，清代文人对杜审言的接受较为全面，既有对其诗文的称赞，也表现其狂言高傲的恃才之姿和讨好武则天的谄媚之态。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上，杜甫和严武相争之事应该发生在最后，却被提到了最前面，由此可见，清代文人接受杜审言最初的联系人还是杜甫。

综上所述，杜审言在宋代因尊杜文风而受到关注，到明代被视为律诗之宗，都与杜甫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借用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和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来解释上面所述杜审言“文章四友”世号的塑造和文学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意见领袖”是指具有一定权威性与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在已获得的信息中加上自己的见解，从而对他人施加影响。欧阳修、宋祁等作为宋代文坛的领军人物，《新唐书》作为宋人理解唐代历史的权威文献，在“文章四友”世号的问题上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后世文人跟随信之，而没有对史料进行考究。“晕轮效应”是指评价者因为受到被评价者某个显著特征的影响，而对被评价者相关事务的评价产生偏差。韩愈赞杜、宋代尊杜之后，杜甫在儒家思想和诗歌审美上都被推为文人的至圣典范，无法超越，这一极高的地位自然产生了对与杜甫相关人物的影响力，无形中提高了相关人物的历史关注度，杜审言作为其祖父是最大受益人。欧阳修、宋祁、辛文房、胡应麟、王夫之等人都是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对杜审言进行了爱屋及乌的评价。至于在当时“文章四友”的世号是否真实存在过，杜审言的诗歌是否真有“诗冠古”的影响等，都被忽略了。

四、“文章四友”和张说文评的排序解析

《新唐书·杜审言传》中关于“文章四友”的行文耐人寻味：“（杜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前半句的叙述中李峤排在崔融之前，后面世号的排序中却将李峤移到了崔融之后，这说明“文章四友”中“崔、李、苏、杜”的排序是有意为之。目前学界关于四人的先后次序的排列依据，还没有定论。

有学者认为，声律习惯和传统郡望是“文章四友”排序的两个主要原因：“崔李苏杜”的排序，主要原因亦在此，用平仄平仄的方式将四姓并列，合乎汉语重视格律的习惯，说到底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和审美追求。唐人强调姓氏与郡望，习称北方大族

为崔卢李郑、南方大姓为朱张顾陆,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这一排序规律。至于为什么是‘崔李苏杜’而不是‘苏李崔杜’,应该是基于声律习惯和传统郡望两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但前者是关键。”^[30]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如果以声律习惯为依据,“崔李苏杜”的排列也合乎平平仄仄的声律习惯,“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正是如此,而且苏味道原就排在李峤之前,“苏李”的并称形成较早且声名较大。《新唐书·苏味道传》载:“(苏味道)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1]4202}这说明史撰者已经认识到“苏李”的并称。但《新唐书·杜审言传》中“文章四友”的排序却将二者的顺序颠倒过来,这表明史撰者在此处并没有考虑声律习惯。其次,以“崔卢李郑”的传统郡望为依据,更站不住脚。在唐初高士廉撰写《大唐氏族志》时,唐太宗就对“崔卢”等唐前贵族十分不满,下令将崔氏从第一等改列为第三等。《唐会要》记载:“(《大唐氏族志》)书成。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第一等?’列为第三等。”^{[2]664}因此,即便崔氏为豪门望族,在唐代也没有理由排在国姓“李”之前。最后,欧阳修、宋祁等撰史之人乃宋人,记载的是杜审言的个人传记,书写时完全没有必要顾虑前朝时期的传统郡望。可见,以声律习惯和传统郡望解释“文章四友”的排序合理性不足。

还有学者认为:“‘崔、李、苏、杜’的名次排列乃是依四人之诗文(尤指策文、表、颂一类)在当时宫廷中之地位及影响而定的。”^[31]从前文张说与徐坚对当时学士的评价可知,张说的排序是以文词水平为标准的,他将李峤排在崔融之前,即表明了二人的高下之别。当时,在官阶地位和文坛声望上李峤都是首屈一指的。《新唐书·李适传》载:“武后修《三教珠英》书,以李峤、张昌宗为使,取文学之士缀集,于是适与王无竞、尹元凯、富嘉谟、宋之问、沈佺期、阎朝隐、刘允济在选。”^{[1]5747}《旧唐书·武延秀传》载:“公主产男满月,中宗韦后幸其第,就第放赦,遣宰臣李峤、文士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阎朝隐等数百人赋诗美之。”^{[3]4734}这说明李峤在武后和中宗时已是文坛领袖。《旧唐书·武三思传》载:“三思又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

之。”^{[3]4736}可见,李峤是宰臣,而崔融只是词人,二者有上下之分。张说将李峤排在崔融之前,非常符合文坛实际。而反观“文章四友”中“崔、李”的排序,如果以两人的地位影响而论,就显得不合理了。

实际上,崔融和李峤在《新唐书》成书之前的史料中经常一起出现,先后顺序一目了然,例如:

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3]5003}

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3]2708}

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32]

其后崔融、李峤、张说皆为一时宗匠,崔、李当曰……^[33]

从中看出,《旧唐书》《唐摭言》《册府元龟》都将崔融排在李峤之前,崔前李后的排序已经成为一定的行文习惯。后撰而成的《新唐书》很可能是受到这种行文习惯的影响,在“文章四友”中将崔融排在了李峤之前。

笔者认为,“文章四友”称号的重点在于“友”,从《杜审言传》的行文上看,“世号”是为上一句的“友”服务的,或者是“友”带来的结果。《新唐书》的主要撰者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应对较多的记录对象时,写道“宜以远近亲疏为别”^[34],这个处理原则在“文章四友”的排序上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四友”的排序是以杜审言与其他三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为依据的。

杜审言与崔融的关系最为密切。垂拱元年(685年),崔融随军出征,作诗《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故人从此隔,风月坐悠悠。”^{[1]766}神龙二年(706年),杜审言回京,作诗《赠崔融二十韵》:“抚躬衔道义,携手恋辉光。”^{[1]738}两人唱和之中,情深义重溢于言表。崔融卒后,杜审言为之披麻戴孝。《新唐书·杜审言传》载:“融之亡,审言为服缞云。”^{[1]5736}《新唐书·崔融传》载:“膳部员外郎杜审言为融所奖引,为服缞麻。”^{[1]4196}“缞麻”是孝服的一种,杜审言作为朋友能像亲属一样为崔融披麻戴孝,足见二人友情之深。

李峤与杜审言的关系较为密切。李峤给杜审言的寄赠之作有《酬杜五弟晴朝独坐见赠》《奉和杜员外扈从教阅》《和杜学士江南初霁羁怀》《和杜学士旅次淮口阻风》,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没有留存有杜审言酬赠李峤的诗”^[35]。张易之事败时,两人同受牵连而被贬。此后在景龙二年,“李峤……为大

学士。……杜审言……为直学士”^{[1]5748},两人同在御前应制,诗存《奉和七夕两仪殿会宴应制》和《奉和七夕侍宴两仪殿应制》。杜审言去世后,“大学士李峤等奏请加赠,诏赠著作郎”^{[1]5736}。明显看出,李峤对杜审言较为亲善,而杜审言对李峤似有些冷淡。这有可能是由于二人官位身份的不同,李峤在上而杜审言在下,这种差距使杜审言对李峤敬重多而亲近少。

杜审言与苏味道早有交情,有《赠苏味道》一诗,但后来两人由于仕途差异而变得疏远。例如被人熟知的杜审言判词“羞死”苏味道一事:“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且羞死。’”^{[1]5735}《唐才子传校笺》论证此事有可能发生^{[26]68}。抛开恃才傲物的时代风气,可见杜审言对苏味道既有友情,但也有傲视对方的争比之心。此事也表明,苏味道与杜审言并不是深交,排在崔融、李峤之后情有可原。

综上所述,“文章四友”中“崔、李、苏、杜”的排列顺序是依据《新唐书》之前的行文习惯和杜审言与其他三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为依据的。

张说对“李、崔、薛、宋”的文学评论反映了初唐诗坛的诗歌价值取向,相关研究可以归为三类:“实用”说、“宏通”说、“文质”说^⑥。不过,学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张说文学评论的后半部分,而对“李、崔、薛、宋”排序没有过多在意。其实,张说文评的排序既反映了四人文章水平的高低,更能代表初盛唐诗坛的评判标准。

在张说的评论中,李峤排第一当之无愧。李峤在武周、中宗时期已是文坛领袖,长期身居高位,诗歌多为宫廷宴集应制之作,其华丽辞藻和近体格律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诗歌创作。李峤后来又有宰相和弘文馆大学士身份,崔融、薛稷、宋之问只能作为文士、学士、直学士排在其后。钱基博先生指出:“崔融汇集其所赋诗,为《珠英学士集》,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而峤为首。”^[36]李峤地位显赫,律诗创作句格宏丽,在当时文坛起到了非常大的引领作用。

崔融与李峤齐名,但在地位和声望上稍逊一筹。李峤贵为宰臣,而崔融只是宫廷词人,但崔融依然能和李峤相提并论,史料中经常将二人并称,如“崔融、李峤、张说皆为一时宗匠”^[33]。崔融编有《珠英学士集》《唐朝新定诗体》,对诗歌声律化进行实践示范和理论总结,其文坛地位之高可见一斑。所以,张说将李峤和崔融排在前两位,合乎实际。

薛稷是初唐时期容易被学界忽略的一位重要人

物。他书画、诗文、道经、集部样样精通,可以说是一位全才文人。史载“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隶书”^[17],其隶书与鹤画成就被世人称赞,人称“鹤师薛稷”^[37]。薛稷对道教经学有很深的造诣,对历代作家的诗文书画、文学评论等也颇有见识。史载“道藏音义目录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1]1520}，“四部书,薛稷知集库”^{[10]157}。张说曾是薛稷的部下,景云元年(710年),薛稷迁工部尚书但不愿就任,张说代其作《为薛稷让官表》,张说“此表既与工部尚书薛稷代笔,当任工侍时所为”^[38]。因此,就薛稷与宋之问排名孰先孰后的问题,张说应该做了认真的考量。薛稷与宋之问的交往原本就十分密切,“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择朝中文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等首膺其选,当时荣之”^{[3]5025}，“唐考功员外郎厅事,有薛稷画鹤,宋之问为赞,故名”^[39]。但在文学创作水平和影响力上,薛稷明显不如宋之问。张说在其文学评论中将薛稷排在宋之问前面,可能还有以下考量:一是薛稷的出身门第较高。薛稷乃“道衡曾孙”^{[1]3893}、“元超从子”^{[3]2591},而宋之问“父令文,高宗时为东台详正学士”^{[1]5750},薛稷的门第出身明显比宋之问高出很多。二是薛稷的官职在宋之问之上。入选弘文馆直学士时,薛稷为吏部侍郎,宋之问为户部员外郎^{[2]1115},因此,应制唱和时薛稷总是排在宋之问前面。如《十月诞辰内殿宴群臣效柏梁体聊句》中云:“宗伯秩礼天地开(薛稷),帝歌难续仰昭回(宋之问)”^{[13]20}此诗因中宗庆祝自己诞辰而起,由中宗作首句,后面接诗的众学士明显是按照品阶排序,张说将薛稷排在宋之问前面或依此理。三是薛稷的诗文创作也不在少数。《新唐书》载“薛稷集三十卷”^{[1]1602}，“宋之问集十卷”^{[1]1600},这说明薛稷的创作成果数量高于宋之问,只是可能因为其政治失败导致文学作品遗失殆尽。

宋之问对近体诗格律的贡献有目共睹,张说将其视为“旧学士”之优者也名副其实。但宋之问与前三者相比,出身、官阶和声望都较低,所以排在最末。此外,宋之问较之于沈佺期、杜审言能被入选张说品评之列,可能还与《集贤注记》的撰者韦述有关。《旧唐书·韦述传》载:“举进士,西入关,时述甚少,仪形渺小。考功员外郎宋之问曰:‘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之问曰:‘本求异才,果得迂、固。’是岁登科。”^{[3]3183}韦述得到宋之问的称赞而登科进仕,在撰写《集贤注

记》时,对宋之问的地位加以提升以报前恩,也是有可能的。

张说是初唐文学向盛唐文学演进时期的一位重要亲历者、推动者,“珠英学士”和“修文馆学士”中的佼佼者、后逝者。他对“李、崔、薛、宋”的文学评价,最接近当世文人对“旧学士”文学成就的真实看法,他的排序反映了当时诗名评鹭的参考标准。

首先,在张说心目中,官职地位和文学成就是成正比的。李峤、崔融都是前朝老臣、重臣,薛稷曾任其上级,他们的宫廷应制诗虽然现在看来价值不高,但在当时的文坛,诗歌创作被皇权接受的程度或诗人与皇权接近的程度俨然是衡量诗人成就高低的参考标准。

其次,张说更推崇状景抒情、托物明怀、能够表达真情实感的诗风。就诗歌本身而论,薛稷的创作远不及宋之问的格律严谨,张说却将薛稷排在宋之问之前。从文学评价角度看,这可能是薛稷的诗风更符合张说的喜好。史书上对张说文学评论的记载位置值得注意,《旧唐书》在《杨炯传》之后附上张说的评价:“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3]⁵⁰⁰³⁻⁵⁰⁰⁴又将张说与徐坚的“旧学士”之论附在其后,意在表明张说对杨炯诗风的赞赏,同时表明张说的评价标准与杨炯的诗文风格有关。闻一多先生指出:“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4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说认为杨炯状景抒情的诗歌风格才是值得推崇的,宋之问的诗歌虽合格律,但多为宫体诗风,薛稷的诗歌却带有杨炯般的托物明怀和真情实感。如薛稷《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隔河望乡邑,秋风水增波。西登咸阳途,日暮忧思多。傅岩既纤郁,首山亦嵯峨。操筑无昔老,采薇有遗歌。客游节回换,人生知几何?”^[11]¹⁰⁰⁶

最后,诗歌的文辞与格律是重要的评判标准。张说评道“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就像金玉在任何地方都宝贵一样,“李、崔、薛、宋”的文词在任何时期都会被视作上品,这反映了盛唐文人依然将诗歌的辞美格律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格律而言,宋之问与沈佺期、杜审言都是律诗高手,三人相差无几,区别可能在于“五言律,杜审言为冠;七言律,沈佺期为冠;排律,宋之问为冠”^[14]³⁵⁵。中宗时期“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41],张说是从初唐宫廷诗风中走过来的,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奉和应制之作,他“对宫廷诗有难以割舍的认同与继承”^[9]¹³²。因

此,张说将以排律见长的宋之问选中,表明他将“文华”的多少视作律诗创作能力的体现。

余 论

初唐时期是诗歌格律体式最终完备的重要时期,从“珠英学士”到“修文馆学士”,宫廷诗人不断涌现,应制活动频繁,群体唱和的创作形成了诗人交往和诗名并存的文学轨迹。“文章四友”中“崔、李、苏、杜”的排序和张说的“李、崔、薛、宋”排序,反映了初盛唐之际诗坛交谊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世人与后世人在诗名评鹭上的差异性。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和“首创工密”诗名的形成,归根到底源于后世人对于杜甫的敬仰,而不是根据杜审言在初唐诗坛的原貌。张说与崔融、李峤、杜审言都相识,他晚年在对初唐文人的评论中,逐一点评了崔融、李峤等活跃于初唐文坛的知名文人,却未提到杜审言和“文章四友”,这间接说明杜审言在当时并没有可以和崔融、李峤相提并论的影响力。张说的“李、崔、薛、宋”提法对我们深入了解初唐时期文坛生态很有帮助,张说论宋之问而不论沈佺期,对于“沈宋”的比较研究有启发意义,“沈宋”一并而论可能并不符合当世文人评价的思路。

注释

①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二)》云:“继上官仪之后出现在武后时代的宫廷诗人是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3页)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云:“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少与李、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61页)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云:“赵州李峤本与同里苏味道齐名,号苏李;又与齐州崔融、襄阳杜审言,并号文章四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61页)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云:“杜审言、李峤与苏味道、崔融并称‘文章四友’,四人中以杜审言最有诗才。”(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189页)②陈尚君《幸有家孙诗冠古久欺公竟成真——诗人杜审言的生平与诗歌》一文指出:“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列名文章四友,更为后世所知的,他是诗圣杜甫的祖父。”陈冠明《杜审言年谱》记载:“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杜甫之祖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友善齐名,为‘文章四友’。”③郑伯勤《论“文章四友”》一文发现多部文学史对“文章四友”只字不提。张家壮《“文章四友”名称、名次考辨及其文学意义》一文首先注意到“文章四友”的称号仅是孤证,但未有进一步研究。史遇春《“文章四友”初探》一文提到“文章四友”很难从唐人的著述中找到痕迹。潘雪《“文章四友”诗歌创作研究》一文认为“文章四友”的排名或是当时人有意为之。④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列“珠英学士”：“张昌宗、李峤、阎朝隐、徐彦伯、薛曜、员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无竞、沈佺期、王适、徐坚、尹元凯、张说、马吉甫、元希声、李处正、高备、刘知几、房元阳、宋之问、崔湜、常元旦、杨齐愬、富嘉谟、蒋凤等二十六人。”(中华书局,2014年,第49页)⑤据《新唐书》和《唐人选唐诗新编》统

计。⑥“实用”说:如彭菊华《张说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精耕《试论初盛唐过渡时期诗人张说》、罗效智《张说对初盛唐文风改变和散文发展的贡献》;“宏通”说:如雷恩海《论盛唐开基者张说的宏通文学思想》、李精耕《论张说文学思想的“通变”特色》、杜佳明《张说文学思想专题研究》;“文质”说:如徐丽丽《论张说的仕宦经历对其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及当时文坛的影响》、胡永杰《论张说文质彬彬文学思想及其对盛唐文学发展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760.
 [6]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7] 吴中胜.杜甫批评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5.
 [8] 陈文和.嘉定钱大昕全集[M].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789.
 [9] 周睿.张说:初唐渐盛文学转型关键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韦述.集贤注记[M].陶敏,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 董浩,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2] 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唐人选唐诗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49.
 [13]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 王步高.唐诗三百首汇评[M].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15] 刘餗.隋唐嘉话[M].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39.
 [16] 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7] 吴玉贵.唐书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8:977.
 [18]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0:392.
 [19]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3.
 [2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89.
 [2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5:527.

[22] 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05.
 [2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4]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142.
 [25] 魏庆之.诗人玉屑[M].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253.
 [26]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7] 孙诒让.温州经籍志[M].潘猛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1666.
 [28]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1248.
 [29] 赵望秦,等.集义轩咏史诗钞校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956.
 [30] 胡旭,林静.“文章四友”及其政治、文学考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54-64.
 [31] 张家壮.“文章四友”名称、名次考辨及其文学意义[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6-21.
 [32] 丁如明,李宗为,李学颖,等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27.
 [33]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校订本.周勋初,等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9763.
 [34] 李德辉.中古姓氏佚书辑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481.
 [35] 赵建明.杜审言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16:13.
 [36]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61-262.
 [37] 李贽.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783.
 [38] 熊飞.张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89.
 [39] 梁章钜.称谓录[M].冯惠民,李肇翔,杨梦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236.
 [40] 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5.
 [41] 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6622.

Poets Friendships and Poetry Evaluations in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Du Shenyan's Poetry Reputation

Wang Wei Ni Chao

Abstract: Du Shenyan being ranked among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the simultaneous dissemination of poetry fame during the Early and Flourishing Tang Dynasty. However, this combination of poetry fame among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lacked sufficient historical evidence. Song Zhiwen’s *Sacrifice to Scholar Du Shenyan* made no mention of it, and the status of Du Shenyan did not match that of Li Qiao and Su Weidao.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time of Du Shenyan recorded in *The Xin Tang Book* was inaccurate. In contrast, Zhang Yue’s literary commentary on Li Qiao, Cui Rong, Xue Ji, and Song Zhiwen better reflecte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oetry circle at that time. The absence of Xue Ji and Song Zhiwen from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obviously did not align with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poetry evaluation at that tim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ultural demand of advocating Du Fu, *The Xin Tang Book* shaped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making Du Shenyan’s poetry fame gradually rise. He was even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 of metrical poetry with the promotion of Hu Yinglin in the Ming Dynasty. Additionally, the ranking of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and Zhang Yue’s poetry evaluation reflected the different friendships formed between Du Shenyan, Zhang Yue, Li, Cui, Su, Xue, and Song during their interactions.

Key words: Du Shenyan; Four Literary Friends; Zhang Yue; Du Fu; Song Zhiwen

责任编辑:采薇